

# 移动政治:短信传播与政治变迁

胡春阳

**摘要:** 移动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政治变迁,这种变迁既影响政治实践的图景,也影响传播实践的现在和未来。最根本的影响是政治参与的主体和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草根权力不断挑战传统的政治精英权力。而传播网络对于公共生活和安全的正向作用始终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 移动政治;短信传播;政治影响;正向变迁

**作者简介:** 胡春阳,女,副教授,文学博士。(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200433)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1) 04-0015-04

我们的时代堪称“手机信息社会”<sup>[1]</sup>——其在社会信息交换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整个世界,手机都很快成为一种重构日常生活、年轻人互动、青少年社会化、与他人获得并保持联系、愉悦以及商业活动、社会行动、爱与战争乃至政治生活的有力力量<sup>[2]</sup>;随着3G技术的推广以及手机服务商和内容生产商的合作和合并趋势的加强,我们正站在手机成为一个个完美的移动的互联网节点的门槛上。

目前,全球有30亿人使用手机,占了世界人口的1/2。其中,大约1亿部手机同时也是照相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手机普及率达到乃至超过100%。2005年,全球发送短信约1万亿条<sup>[3]</sup>。与对其他传播技术采纳滞后相比,集聚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亚洲和非洲在手机采纳和使用上表现出惊人的局势。2000至2002年5月的短短两年多时间之内,非洲移动电话的数量从200万增加到3000万,和固定电话一样普遍<sup>[4]</sup>;1999-2004年,非洲手机订户从7.5百万增加到7.68千万,平均年增长率高达58%。而亚洲同时期的年增长率也高达34%<sup>[5]</sup>。2005年,77%的世界人口居住在移动信号覆盖地区;到2008年底,全球有接近40亿手机用户,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手机普及率达到乃至超过100%;据估计,到2010年,全球将有40亿手机用户,而坐机则从世纪之交的17亿降低为14亿(GSM Association, 2008)。毫无疑问,21世纪的最初10年,电子传播领域最为华彩的篇章就是手机传播。

## 一、手机的政治影响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见证了迅速扩散的互联网传播技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震撼力。近两年来,作为最强势传播渠道的手机和互联网进一步强强联手,在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甚至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和传播图景。当然,也被用于发动恐怖主义、种族骚乱等行动。从英国保守未来党(Conservative Future)(2002年9月)和纽约市长米歇尔·布鲁伯格(2005.11.1)分别用短信与民众进行竞选沟通到(2004.4.8)欧盟宪法被翻译成缩略语短信进行传播,再到(2005.5.16)法国政府发送贸易知识短信50万条给年轻人;从法国总理Jean-Pierre Raffarin(2004.6.1)、伦敦市长(2005.11.16)和普金总统(2005.9.27)分别通过短信、网站回答人民的短信提问到印尼健康部门开通热线(2005.8.23),让警察用短信报告疾病暴发和健康关注的抱怨(如禽流感、登革热);从(2001.1.20)菲律宾总统Joseph Estrada在百万市民短信洪流游行抗议中丢失权力到(2004.3.16,下午6点)西班牙发动“短信息”之夜游行抗议选举阴谋;从(2004.9)澳大

利亚大使馆爆炸前警察被恐怖组织的短信警告威胁到(2005.12)极端民族主义者用手机组织悉尼金色海岸集会激起阿拉伯人和澳洲人的种族冲突……

《21世纪的民主来自公民的“拇指”》<sup>[6]</sup>一文这样说道:手机力量和互联网力量使人民更有力量,如果说印刷媒介引导了现代革命,电视推倒了柏林墙,呈现为短信和互联网的拇指革命将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目前正在破坏被控制的社会坚壁。“诸如电邮、短信等新技术极端改变了动员人们的方式”<sup>[7]</sup>,它使相识或不相识的个人在片刻的刺激中行动一致以及没有事先计划的情况下被召集调动起来<sup>[8]</sup>。

总之,手机传播已经成为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部分,甚至在未来堪称关键要素;也挑战了我们当前的政治能力的水平。

## 二、手机技术的传播特点

与互联网传播一样,手机传播是操练人们接近大量信息并发展良好判断能力的良好工具,也被看作是个人的权力的伸张工具,而且,比之电视,政府的审查和控制更为困难<sup>[9]</sup>。但是,由于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并创造了更多的传播效能,手机的民主化影响被认为高于互联网。

(1) 弥补“数字鸿沟”,由于网络接近的经济成本和接近所需要的技术知识水平都比较高,“数字鸿沟”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现存社会排斥形式的扩大的担忧在人们中普遍存在。“使用因特网的人口至今还是小部分精英,这些人不到世界人口的1/10”<sup>[7]</sup>,低层次群体政治参与者很少是被因特网动员起来的<sup>[10]</sup>。而手机传播全面整合了人的感官——直接充分发挥了人的耳朵、嘴巴、视觉、指尖等感觉的天然的、原始的灵活性,人们不需要昂贵的地面设施、网络高层次的技术和语言能力就可以最大限度最快地共享信息,因此,大大降低了接近权的成本,更具有接近权的普世性。

(2) 手机的文本性允许随时随地交流,不受情景限制,信息可以瞬间穿过多重迭的社会网络得到传播并使社会动员即时产生现实效果。在欧洲,互联网使用者与手机使用者之比是1:2.4,在西班牙,该比例是1:3.8<sup>[8]</sup>。手机信息复制与传播的范围显然与互联网有实质的差异。

(3) 手机传播对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延伸了缺席在场的领域,一旦和大众传媒结合,影响任务的先后顺序、对情景和事实的定义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社会结果:第一,把更多非当事人瞬间带入事件,更多的人能够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及时的、强大的证据链,并和参与者适时交流;第二,信息可以顺手拈来,俯拾皆是,获得访问、接近不那么紧急了;第三,颠倒任务的先后顺序,促进适时乃至同步决策,增加决策灵活性。9.11事件中,由于飞机上的人们与地面人们用手机适时交换信息,使飞机上的人们适时决策阻止了劫机者把飞机飞往预谋建筑目标的结果的发生;第四,使日常生活和非常事件融合,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见证和参与重大事件。在9·11事件中,由于地面与飞机上人们适时沟通,当飞机毁灭的瞬间,有乘客正和父母通话,而其父母也正在家中通过电视观看这一场惨无人道的灾难。

(4) 社会亲近性增强:手机不像因特网具有社会逃避的作用<sup>[2]</sup>,它的传播是基于现实的人际互动网络的,把本来看来陌生的整个世界瞬间连接、整合为一个巨型的人际传播网络。

(5) 网络监管比较容易,但手机监管和审查不太容易<sup>[11]</sup>。

(6) 手机传播几乎整合了一切传播技术的功能——把大众传媒“一对多”模式、电话传播“一对一”模式以及互联网传播所有优势整合起来,实现了“一对多”、“多对一”、“一对一”、“多对多”的全部组合,构成一个多元的远距离的、灵活性和非中转兼具的传播系统。2005年7月7日伦敦爆炸中,人们见证了市民报道的涌现,人们用手机制作事件短视频并广泛传播。

## 三、手机政治的正向变迁

我们很难清楚地用好或坏来界定手机短信传播对于社会、政治的影响力,正是技术和认知以及社

会力量的聚集推动了手机的真实力量——既是建设性的也是破坏性的<sup>[4]</sup>。因此，媒介并非天然具有民主性或反民主性，它对于我们政治生活的贡献将继续取决于它们赖以运作的法律、经济以及社会背景<sup>[12]</sup>。但无论如何，手机短信具有改变政治行为的某些方面的潜力，包括人们期望参与政治过程的愿望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斤斤计较手机的影响力的好坏，而是思考如何保障手机短信的动员、组织、协调力量发展的正当方向。在我国政治和社会实践面临的主客观环境都发生极大变化的当前语境下，尤其要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

客观上，我国政治实践中必将有更多的国际元素加入，手机短信有可能成为由手机短信触发的现实运动中尝到甜头并日益演练成熟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政治力量与我国进行政治博弈的常规武器。在目前的全球新政治图景中，有序的政治参与本身就无法回避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主渠道的参与模式。

主观上，当前我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和谐社会生活的本质还是在于政治生活的和谐”<sup>[13]</sup>，而政治和谐的保障乃是党的16届2中全会上胡锦涛所强调的：“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完善人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以及“通过人民对于政府和国家的广泛认同以及对于政治权力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和意志的表达”。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政治参与成本较大的国家，直接或间接的意志表达可能目前最现实的途径还是手机媒介。因此，面对全球政治的此情此景，我们的作为是：

(1) 必须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良好的公共治理是交互式的社会，要随时意识到保持民主、科学和文化开放、传播渠道的可接近性的必要性。我国正在经历社会剧烈转型，利益分化较为严重。分化不可怕，不和谐不可怕，可怕的是用不正确的方式去处理。正如 Justin R. Oberman<sup>①</sup> 所言：有政治气氛的地方才会有政治使用，在没有革命的时候你不可能创造革命！除非现实有大量政治要素和兴趣，否则政治运动者手机媒体的使用不会成功。因此，为避免破坏的集合行为，社会应建立合理的减压阀以便疏导不满情绪并解决问题。虽然这对政府能力是个挑战，但这股全球新政治潮流锐不可当，必须这样做。

(2) 政府作为公共治理和社会行动的主体，要充分认识到建立健全包括手机政务在内的电子政务的现实紧迫感，积极主动发展全新的政治文化，推动政治社会化。当前，世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手机短信在公共行政管理及治理中的巨大作用。由于短信传播来源不可知，容易制造混乱；而且，手机短信传播对于即刻动员非计划的、无组织的、分散的人群开展临时的闪击游行的巨大效果是任何媒介也难以匹敌的，其所动员的社会行动更具有社会学称之为集合行为（那些超出日常生活制度框架的群体行为）的特点：多人性、突发性、非组织性、非理性。因此，建立一个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统筹协调的综合的手机信息发布系统十分必要，这样的系统可以有效纠正人们对现实事态的误解、偏差，延缓突发性，打散其多人聚集的可能性，并促使人们偏向更为理性的行动。由于手机短信动员和协调往往和互联网传播相互交叉和借用以便达到最大政治行动效果，而且，对于有长期政治目标的组织来说，因特网在坚持持久斗争、使目标和行动议题得到深入讨论方面更有优势。因此，政府的“手机信息发布系统”应该和互联网信息发布和监管系统联合设立。具体做法是：

第一，各级政府应该加强与手机内容生产商以及服务商的合作，像美国华盛顿那样，开发、建立“短信警告传输信息系统”，在重大的社会（福利、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方面）、政治、经济危机事务和紧急事件中，适时跟踪危机进展，适时传送有关危机的正面信息，引导公众开展理性的、有秩序的社会行动；

第二，像韩国那样，通过与科研单位、手机服务商等合作，建立“国家手机舆论调控系统”，以保障在国际政治斗争中随时保持灵活的应变力和主动性；

第三，各级政府应该主动积极开展“手机短信政务沟通处理系统”，安排专门的工作机构与技术保障

① Justin R. Oberman 是自由作家，博客艺术家和顾问，是个人民主论坛的手机通讯员，数字主义的建立者，whatwoulddumbledoredo.org 的站点管理员，为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民主和互联网学院发起的同名的 Politics 2 Go Moblog 会议创立了站点。

体系,及时听取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建议,鼓励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

第四,文化教育机构要重视创造丰富生动的手机内容,像法国那样把手机变成年轻公民政治、文化、经济素质提升的一个重要平台,这不仅是大众传媒机构的重要业务(比如,手机报纸、手机电视等),也是政府文化职能部门应该积极投入和参与的;

第五,开展类似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乡村手机运动”。这个运动的发起者是微观财经的倡导者 Muhammad Yunas,他创办的 Grameen 银行积极推行贷款买手机计划,促进了人们做生意的效率,帮助孟加拉国的人们从贫困中走出来。手机为孟加拉国增加了 6.5 亿国民生产总值,创造了 24 万个工作机会。虽然,我国农村手机普及率逐步提高,但妇女和老人的拥有率并不大,政府可以提供一些财政保证和实施一些推进计划,以帮助乡村在获取经济信息和国家政策方面减少人为的阻力,从而提高乡村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活力。

(3) 政府要加强手机传播的立法监管力度。但是,在公共治理理念已经渗入人心的时代,“堵”显然不该是唯一的、重要的手段。虽然可以像印度(2002 年)或尼泊尔那样(2006 年)以避免冲突和国家安全为名,暂时中止短信服务以便确保作乱者不要通过散布错误谣言而制造恐慌,但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短信服务一恢复,骚乱仍然继续。这就要回到第一、二个要点,即减压阀和正面的舆论引导机制是否充分发挥效能?而且,信息自由与公共安全、个人隐私等方面的关系还有待人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

总之,信息系统的融合并不意味着会导致即刻的社会一体化或社会和谐,实际上,信息整合的最初结果是加剧社会的紧张<sup>[14]</sup>。因此,如何保障信息的客观性与规范性参与以及控制政治欺骗就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并需要足够智慧才能够解决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1] Jenny Lankester&Adam Murray,“New findings on the way mobile phones have changed the way we live”, www.mobilelife2006.co.uk ,24/07/2006.
- [2] Paul Levinson,“Th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Mobile Medium and How It Has Transformed Everything!”, Palgrave Macmillan, April 17, 2004.
- [3] Roland Piquepaille ,“Howard Rheingold about our mobile world”, <http://blogs.zdnet.com/emergingtech/index.php?p=271> July 20, 2006.
- [4] 温卡塔拉曼. 媒体与恐怖主义[M]. 赵雪波主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32.
- [5] SHARON LaFRANIERE,“Cellphones Catapult Rural Africa to 21st Century”, August 25,2005 ,<http://www.nytimes.com/2005/08/25/international/africa/25africa.html?ex=1282622400&en=32b49363eac57aae&ei=5090&partner=rssuserland&emc=rss>.
- [6] The Dong - A Ilbo,“21st Century’s Democracy Comes From Citizens’“Thumbs””,2005. 5. 11.
- [7] Stefania Milan “A Click Becomes a Political Tool”,<http://www.globalpolicy.org/ngos/advocacy/network/2004/0320click.htm> ,Inter Press Service ,March 20, 2004.
- [8] Sandra L. Suárez,“ Mobile Democracy:Text Messages, Voter Turnout, and the 2004 Spanish General Election,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2005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ptember 1 - 4, 2005.
- [9] Rheingold, Howard (2002) 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Perseus.
- [10] Rich Ling,“The Mobile Connection : The Cell Phone’s Impact on Society ” [M](The Morgan Kaufmann Series in Interactive Technologies) ,Morgan Kaufmann ,3rd edition,May 18, 2004,P18.
- [11] Yardley, Jim (2005) ,“A Hundred Cellphones Bloom, and Chinese Take to the Streets”,The New York Times, 25 April 6 - 19.
- [12] (英)布莱恩·麦克奈尔. 政治传播学引论[M]. 殷祺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218.
- [13] 桑玉成. 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A]. 上海市政治学会. 和谐社会与政治发展[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8.
- [14] 梅洛维茨.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 肖志军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25.